

江西通史

11

民国卷

钟起煌 主编

何友良◎著

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



主编 钟起煌
顾问 周奎书
副主编 邵 鸿 彭适凡(常务) 方志远

江西通史

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

江西通史

— 民国卷 —

何友良
著

中 师 范 大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西通史·民国卷/何友良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8.1

(江西通史/钟起煌主编)

ISBN 978 - 7 - 210 - 03653 - 1

I. 江... II. 何 ... III. 江西省 - 地方史 - 民国
IV. K29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8784 号

江西通史·民国卷

何友良著

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31.25 插页:4

字数:520 千 印数:1—3200 册

ISBN 978 - 7 - 210 - 03653 - 1 定价:65.00 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政编码:330006 传真电话:6898827 电话:6898893(发行部)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江西通史》编辑委员会

主任 钟起煌

副主任 钟健华 傅伯言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志远 孙家骅 邵 鸿 林学勤 彭适凡

编委会办公室

主任 孙家骅

副主任 游道勤

工作人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琴红 王紫林 曾 敏

常务编辑

林学勤 徐建国 游道勤

总序

钟起煌

世界上的很多事情都是由机缘而起因执着而成,包括我们这部《江西通史》。

说由机缘而起,是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几乎纯属偶然。2002年夏天,我和彭适凡、孙家骅同志谈到江西悠久的历史、谈到江西辉煌的文化,因而产生了组织专家编撰《江西通史》的设想,彭、孙二位当即认为此举当行而且可行。

说因执着而成,是因为一旦有这个想法,而且认为这是一件研究江西历史、弘扬江西文化的重要工程,就决心去做。为此,我征询了周銮书同志的意见,并邀请邵鸿和方志远同志共商此事,得到他们的热烈响应。2002年10月18日,在江西省文物局和江西师大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共同举办的全省文博教育成果展示与经验交流会上,我向大会通报了编撰《江西通史》的意见,引起全体代表的热烈反响,大家用长时间的热烈掌声表示支持,认为这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挖掘和整理江西传统文化、推进江西经济文化建设的一大盛事。有了这个共识,12月13日,准备工作进入实质性阶段。在我的主持下,召开了有关专家和编辑人员的联席会议,对编撰《江西通史》的指导思想、作者人选、工作日程、成果形式等具体问题展开了比较细致的讨论。2003年2月15日,召开了第一次编撰工作会,《江西通史》的编撰工作就此正式启动。

虽然说是机缘和偶然,但新的《江西通史》的编撰,实具备诸多因素和条件。

一、江西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在江西这块土地上,人类的活动至少已有20万年历史,它是中华民族发展史和古代文明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唐末五代以来,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江西遂为

全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省份之一,其物产之富、人才之众,举世瞩目;进入20世纪,江西又因为中央苏区的建立而成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很难想象,在十分漫长的时段里,没有江西的中国历史将会是什么样子。

二、文献与实物资料丰富。江西既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誉(唐王勃语),又素称“文章节义”之邦(宋司马光语)和“人文之薮”(清乾隆帝语),存世官修私撰文献极为丰富。近年来一系列的考古发现,既可弥补文字记载之不足,更可与文献资料相互印证,为编撰《江西通史》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实证材料和科学依据。

三、前期成果丰硕、学术队伍整齐。老一辈的历史学家仍然健在,他们不但学术积累深厚,而且对研究江西历史有着强烈的责任心;中青年学者正趋成熟,他们继承了前辈学者的严谨学风,又吸收了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思维敏捷,勇于创新。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这些年来已有大批高质量的有关江西历史的学术成果问世,这些成果涉及江西历史的方方面面,为编撰《江西通史》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四、政治环境宽松、经济形势发展。盛世修志是中国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政通人和,国泰民安,江西经济和全国一样,有较快速度的发展。这为编撰《江西通史》提供了自由的学术气氛和比较充裕的财力保证。近年来,江西的学术事业和出版事业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连续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给江西文化艺术界和学术界以振奋,也引起了各兄弟省市的关注。这些成就的取得,为我们组织大规模著作的编撰工作提供了经验。而周边各省如湖北、湖南、浙江以及其他省市新编通史的纷纷问世,对《江西通史》的编撰是有力的推动,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五、从我个人来说,当时也恰恰能分出一些精力和时间来抓这件事情。于是尽力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为作者们、编者们排除各种障碍,以保证这项伟大工程的圆满完成。

四年来,《江西通史》的编撰工作得到了各方面的关心和支持。黄智权、吴新雄省长亲自过问此事并指示有关部门给予支持,省政协将其作为一件大的文化事业进行推动,省社联将其列为重大科研项目,江西师大、南昌大学、省社科院、省文物局、省博物馆和省考古所等有关单位也对参与编撰的专家们给予各种便利,出版部门派出了强大的编辑班子并准备了足够的启动和出版资金。特别要指出的是,各位作者在繁忙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能够将《江西通史》的

写作列入重要的工作计划并全身心地投入。我在第一次全体编撰会议上指出,《江西通史》的编撰是一项挖掘和弘扬江西历史文化传统的千秋事业,希望作者和编者将其视为自己学术生涯中的重大事业。事实证明,作者和编者后来都是这样要求自己的。正是因为有了各方面的支持和全体编撰人员的共同努力,11卷的《江西通史》才能顺利地完成书稿并得到如期出版。

明代中期,随着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修撰地方志成为一大文化现象。各省、各府乃至各县的省志、府志、县志大量涌现。此后遂为传统。盛世修志也不仅仅限于修前朝历史,更大量、更具有普遍意义的乃是修当地地方史。具有全局意义的江西省志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自明中期以来,江西整体史著作已编撰过多部,其中著名的有:林庭俺《江西通志》(37卷,明嘉靖四年),王宗沐《江西省大志》(8卷,嘉靖三十五年;万历二十五年陆万垓增修),于成龙、杜果《江西通志》(54卷,清康熙二十二年),白潢、查慎行《西江志》(206卷,康熙五十九年),高其倬、谢旻《江西通志》(163卷,雍正十年),刘坤一、刘绎、赵之谦《江西通志》(180卷,光绪七年),吴宗慈、辛际周、周性初《江西通志稿》(9编,民国三十八年)。上世纪末,又有许怀林的《江西史稿》(1994年,江西高校出版社),陈文华、陈荣华主编的《江西通史》(1999年,江西人民出版社)问世。这些著作在保留江西历史遗存、挖掘江西历史文化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如何在充分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是对新编《江西通史》的重大考验。

为了使新的《江西通史》更具有时代特色和历史价值,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们对这部著作提出了以下的要求。

一、中国历史是一个整体,我们在研究任何地方历史的时候,都不能脱离这个整体。因此,正确认识各个历史时期江西在全国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就显得尤其重要,必须充分关注江西与中央、与周边地区的关系,不溢美、不自卑,不关起门来论江西,将《江西通史》写成一部与中华民族的整体有着血肉联系的江西历史。

二、《江西通史》是系统记述和研究江西历史的大型学术著作,由众多学者共同参与完成。一方面,各卷是作者的个人成果,是作者最新研究成果的结晶,可以也应该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所以希望作者精益求精,使其成为各自领域的学术精品。另一方面,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它又必须是一个整体,是一部“通史”,所以全书11卷必须有统一的体例和统一的要求,在文风上一定要力求简

洁、明快。各卷作者务必服从整体、服从大局,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整个《江西通史》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江西通史》必须是一部真实、动态、有可读性的信史。所谓真实,是指史料翔实、言必有据。此“据”是经过考证后认为合理的,否则,“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孟子语)。这就需要每个作者既尽可能地系统爬梳和挖掘史料,又谨慎辨析和使用史料。所谓动态,是指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既将问题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又特别关注它的演进过程,因为即使是同一件事物,其状态和作用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迁而变化的。这就需要每个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阐释历史、去探讨历史演进的规律。所谓有可读性,是指应该用流畅的文字、叙述的方法写作,展示的是作者的观点和结论,而不是考辨的过程,它的体例是史书而不是论文。无图不成书。图文并茂是中国出版物的优良传统和重要特点,《江西通史》应该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收集能够说明江西历史各阶段各方面状况的历史图片,以加强其历史感和可信度,同时也使其更具有可读性。

四、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以基层社会为本。所谓以人为本,指的是要写人的历史,以人的活动为描述对象,即使是制度、习俗,也应尽可能地有人的活动。所谓以民为本,指的是尽可能地站在大众的立场上来叙述历史、看待历史,更多地叙述大众的活动。所谓以基层为本,是因为地方史本身就是基层乃至底层的历史,要尽可能地揭示基层组织和底层社会的活动状况。在此基础上,充分重视统治者和社会精英对社会的主导作用,重视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特别是包括传统价值观念和现实政治制度等在内的上层建筑对个人、对大众、对底层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写成一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互动、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互动、社会精英与人民大众互动的历史。

11卷本《江西通史》即将付梓,我们希望它的出版能够成为江西历史研究的新的里程碑、能够成为江西文化史上的一大盛事。当然,能否达到这个目标,还要由读者和历史来检验。

导 论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中华民国的成立,在中华大地上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和清朝二百六十多年的统治,开创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新阶段。

本卷叙述的是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年)的江西历史。中华民国是一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国社会性质发生剧变,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也是社会内容既丰富多彩又复杂多变,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纠结交替,现代国家在建设和战争中曲折前行、走向崛起的重要转型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内,现代城市建设、社会公共领域和现代生活与时尚也不断呈现新的面貌。这一切,既是历史的丰富内容和质的规定性,又是江西民国历史形成和发展的宏大背景。本卷即是在这一规定性和时代背景下,对江西的民国史进行考察和叙述。

—

江西在民国历史上具有鲜明的特点与重要的地位。从历史的独特性和对国家的影响与贡献上看,其特点与地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中华民国的开国史上,江西是革命的首义地区之一。萍浏醴起义、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为民国的创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萍浏醴起义,是1906年12月4日(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九日)萍乡籍同

盟会会员蔡绍南与湖南籍会员刘道一等奉孙中山派遣，从日本返国领导发动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首发于萍乡，揭出“中华国民军”的名号和表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纲领的起义檄文，数日间遍及浏阳、醴陵、宜春、万载等赣湘边境十多个县。起义虽然在清政府调集的四省重兵镇压下失败，但它是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后举行的第一次以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制国家为目标的大规模武装起义。起义爆发，如孙中山所说，引起“全国震荡”，一系列武装起义随后在全国各地接踵举行，直至辛亥革命取得成功。因此，这次起义和其他各次起义一起，成为辛亥革命的前奏，敲响了封建帝制和清政府覆灭的丧钟。

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爆发的辛亥革命，迅速波及江西。江西成为仅比湖南、陕西晚一天的全国第三个起而响应革命的省区。10月23日，由同盟会会员掌握的驻九江新军五十四标奋起响应武昌起义，宣布独立。31日，同盟会会员蔡公时发动南昌新军起义，建立了江西军政府，江西全省遂告独立。江西独立，壮大了革命的声威，对长江下游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江西既定，东南盖不足谋”，“由是而苏而浙而皖，革命之声势骤盛，两月之间披靡全国，真亘古所未有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的结束，创建了中华民国。

民国成立之初，面对掌握总统职权的袁世凯镇压国民党人民主政治斗争的形势，江西国民党人拥护孙中山兴师讨袁的主张。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率先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誓师通电讨袁。南京、上海、安徽、湖南、广东、福建、重庆等省市纷起响应，共同兴师讨袁，形成民国史上著名的国民党“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在袁世凯重兵围攻下，虽然只坚持了两个月，但其所表现出的民主革命精神和无畏气概，所坚守的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和共和原则，在中国国民党史和中华民国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第二，江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的主要地区，中共在江西领导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导引了中国的前进方向和历史命运。

在江西这块土地上，中共首举武装反抗国民党建立一党专制统治的大旗，举行八一南昌起义，提出并实行土地革命、人民政权和以苏维埃救中国的革命纲领和建国方略，建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江西作为中共领导土地革命的中心区域，先后创建有井冈山、中央、赣东北（闽浙赣）、湘赣、湘鄂赣等革命根据地，江西拥有全国最早、最大和最多的革命根据地，全省三分

之二以上的地区曾为苏维埃区域,被人们称为人民军队诞生的摇篮、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摇篮,打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摇篮,“中国革命前进的伟大基地”。毛泽东等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江西这块红土地上战斗、生活和创造,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初步创立了指导中国革命的科学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开辟了中国特色的中国革命胜利之路,学习和实践了治国安民的艺术和战争的艺术,建设了一个廉洁的政府和一支坚强的人民军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了一大批会治党、治国、治军的优秀骨干力量(中共第一、二代领导集体成员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张闻天、任弼时、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胡耀邦、杨尚昆等,当年都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叱咤风云的主要或重要领导人;新中国建国初期担任从国家主席到省部级职务的党政军领导干部中的140多人,人民军队的9位元帅、7位大将、34位上将、114位中将与更多的少将,曾在江西红土地上战斗、生活,经历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的考验)。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等地的奋斗,揭示、引导了中国的前进方向和历史命运。以中央革命根据地为中心的土地革命史和革命战争史,成为中国共产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也是中华民国史上极富特色和地位的重要内容。

第三,江西是国民党统治的重心地区,在国民党执政后的民国政治、经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地理上,江西位处长江中游、东南腹地,史称“吴头楚尾,粤户闽庭,形胜之区”,尤其是毗邻国民党中央畿重地,是卫护南京和苏浙的重要战略区。在政治上,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政党。在很长时间内,江西在总体上属于国民政府切实管辖的省份之一,是国民党统治的基本地区。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前的10年间,江西还是国民党党政军要人在地方活动最多的省区之一,庐山被称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夏都”,每到盛夏酷暑,从国民党中央党部到国民政府各院、委、部,纷纷迁至庐山办公,国民党的许多内政外交、政治经济军事方针,是在庐山作出的。蒋介石在南昌设立的行营,更是地位特殊,以至于“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真正的首都。军事行动之外,行营更致力于政治、财经措施”,成为“南京统治的党政军中枢”,而被胡汉民斥之为“驾乎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的太上党部和太上政府”。数年间衮衮大公、森森冠盖往来于南京、江西之间,极一时之盛。在经济上,江西是传统的粮食主产省,农业资源和矿产资源极为丰富,在民国经济格局中,也有其独特的优势地位。

第四,江西是东南抗战的重要省区,为民族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期间,江西是东南抗战的重要省区。全省以大量的粮食和兵役、夫役,支持第三、第九和第四战区的作战,给国家贡献壮丁 103.8 万人,每年征收征购粮食达 5000 余万石、年平均占重庆国民政府征粮总量的 12.9%;公营和民营工商业也因战争的需要,得到国民政府的扶持,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在大后方近 20 个省中位列前茅(可惜在 1945 年初被日本侵略军摧毁殆尽),为支持东南地区的抗战和资助西南大后方,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时人论述江西在东南和全国抗战中的地位,认为江西是屏蔽西南、支撑东南的重要军事堡垒和粮食仓库,指出在抗战大局中,“江西屏藩湘粤,控制苏皖,进击长江,可截敌人之腰,俯窥金陵,可瞰敌人之背,地利所宜,实反攻收复失地之前卫,且鱼米财富,素称丰饶,抗战以来,资助后方,允属柱石”。

二

民国时期的江西历史进程,以 1926 年秋北伐军攻占南昌实现政权转换为界,经历了北洋政府与国民政府两个统治时期。在现代社会转型和民族民主革命交相行进的背景下,革命战争、民族抗战、现代建设和国家权力深入基层的社会控制,构成江西民国历史的主要线索。这些主要线索如何展开和行进,江西民国历史是怎样走过来的,是本书所要叙述的主要内容。

江西民国史,可以上溯到国民党早期革命组织的建立。1905 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后,孙中山派会员黄格鵬(清江人)、魏会英(赣州人)回江西发展组织。1906 年,他们以 1904 年成立的反清革命团体易知社、我群社为主,建立同盟会江西支部。同盟会是中国最早建立的革命政党,也是国民党的前身,它在江西机构的设立,表明江西从此有了国民党的组织。同盟会江西支部与 1909 年为联络会党而建立的反清革命团体共进会江西分会(会长邓文翬),在全省秘密发展组织,掌控新军和会党,发动反清武装起义,是萍浏醴起义、辛亥革命江西光复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民国成立,江西政权为革命党人所掌握。1912 年 8 月,孙中山等以中国同盟会为基础组成国民党。国民党的称谓,即从此始(1914 年孙中山另组中华革命党,1919 年恢复国民党名称,改称中国国民党)。江西的同盟会、共进会两组

织随即奉国民党本部之命,合组为国民党江西支部。这时,国民党党员遍于全省,为数不下2万人,江西的国会议员和省会议员,也大多数是国民党人。因此,这个时期被江西国民党人认为是一个“全盛时期”。1913年江西首先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与此不无关系。

1913年7月,袁世凯派北洋第六师师长李纯进军江西,一个多月间打败反袁的数万赣军,国民党领导的“二次革命”在江西宣告失败。李纯随即署理江西都督,建立起北洋军阀对江西的统治,同时对曾担任文武官员、记者的国民党人,和国民党籍的10名国会参议院议员、25名众议院议员以及众多省会议员,“一律按册缉捕”,给全省的国民党组织以毁灭性的打击。江西国民党人徐秀钧(时任国会众议院议员)等被捕杀,其余“尽为亡命”,“四方窜伏,而以日本东京为最多”。

北洋军阀入主江西,开始了对江西长达14年的统治。在这一长时间内,江西被裹入社会大转型潮流,一方面,北洋军阀的暴戾统治及由此产生的战乱,给江西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另一方面,因为时代的变化,全省政治、经济和文化形态也日益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出现了许多以往所不曾有的新鲜事物。江西曾长期处于南北战争的前线,境内多次发生过局部战争和客军过境,时局动荡在不少年份成为基本特征。军阀始终主导着全省政权,但在民国和民主的大背景下,行政体制也有较大的改变和创新。新的政治学说、思想观念、政党组织和文化运动,通过上海、北京和广东,相继传入江西并在社会尤其是青年中引起巨大反响;以“赣人治赣”为核心的自治运动风靡一时;五四运动和抵制日货行动在全省高潮迭起,作为革命政党的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先后在江西恢复建立和创立自己的组织,主要以秘密方式进行组织建设、武装起义和响应北伐战争,引导国民革命和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农业仍然在经济中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但新型的资本主义经济乘势而兴,出现一个创办实业的小高潮。近代教育体制逐渐建立,中小学教育和留学教育出现新的气象。所有这一切,构成这一时期社会变动和社会转型的基本内容和重要特点,也折射出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的多样性。

北伐战争开始前后,国共合作领导的国民革命,在江西逐渐走向高潮,江西历史进入重要的转折时期,也呈现出空前的复杂性和尖锐性。其间,既有国民革命气势如虹的浪潮,北洋军阀政权向国民党政权转换的新旧政权交替,为期66年的九江英租界被革命政府一举收回,有组织的民众力量走上政治舞台,

也有革命内部各派力量由联合对敌转为分裂对立，国民党右派与左派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国民党右派与中共及工农民众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并在共同进行的对北洋军阀的作战中，日益激烈、直接地显露出来，影响和左右着江西政局及其走向。后期出主江西政务的朱培德，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权、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权以及中国共产党之间，依违留连，加剧了政局的波谲云诡和各派力量的兴替消长。几经反复、周折之后，江西最终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一个基本政区。

1927年国民党实行反共清党政策，其自身性质发生变化。同年4月成立南京国民政府，次年完成北伐统一，国民党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政党，实行以党治国、以党治政和以党治军，其政治地位较之以前有了根本变化。在与国民党合作领导革命建国的模式夭折后，中国共产党被迫另辟新路，举行八一南昌起义、湘赣边秋收起义，开始走上独立领导土地革命、探索重建现代国家的艰难征程。土地革命时期，江西六十多个县曾被红色武装所割据或冲击，出现“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的革命局面。中共相继在江西建立井冈山、赣东北、中央、湘鄂赣、湘赣革命根据地，为大规模领导武装斗争并将土地革命的中心放在江西，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坚实的力量。江西人民在土地革命战争中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仅参加红军者达30多万人，有名有姓的革命烈士达25万多人，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人民大众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奉献。江西历史，因此高峰凸起而为国内外所瞩目。

1927年夏到1937年夏的10年，内战和建设两种情形，在江西交替出现。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创建革命根据地、领导土地革命的斗争，作为现代中国发展另一条道路的探索，形成对执政的国民党的严重挑战。因此，国民党出动大军，从以小规模为主的地方性作战到由中央主导指挥的大兵团军事进攻，对中共 and 红军进行长期的反复的“围剿”。江西省在1927年起的七年中，成为国共两党“围剿”和反“围剿”战争的主要战场之一。期间，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许多大政方针和重要决策，是在江西等地针对着革命根据地作出的，其中不少明显地受到革命根据地政策的深刻影响；国共两党的活动尤其是建国方向与治政方略，也围绕着战争的行进，得到充分的展示和实践。国共两党以“围剿”和反“围剿”的军事作战形式进行的斗争，对中国历史和国共两党，以及对江西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1930年底，蒋介石入赣指挥对红军的第一次“围剿”战争，同时负责统一指导地方党务。由此而至1934年第五次“围剿”结束，江

西省党政事务,转入以协助“围剿”军事为中心,省政府、省党部依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的安排,竭力进行了行政机构改革、编组保安团和保甲组织、地方自治、厉行新生活运动和“协剿”活动。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后,当局继续进行“清剿”红军游击队,但“善后”与建设成为当时的主题。江西在省政府主席熊式辉的主持下,收拾残破,力行革新,大吹建设之风,推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取得了一些让世人瞩目的成绩,为此后到来的抗日战争,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江西既是前线,又是后方,是我国东南地区抗战的重要省区。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当局比较注重抗战动员,北方和东南沿海大量知识名流和流亡学生进入江西,给江西带来勃勃生气,全省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声震东南。新四军军部在南昌建立,编入新四军的南方红军游击队将士由此走上抗日前线。第三战区在赣东,第九战区在赣中、赣西北,分别与入侵的日军形成对峙,江西处在东南战场对日作战的前线,日本侵略军根据中国军队仍拥有相当大的兵力,主力军部署在湖南、江西及贵州省方面,“其中江西、湖南两省是抗战的屏障”的判断,连续发起对湘赣的作战,企图打开进入西南的通道,打破中国长期抗战的战略。由此,江西作为中国抗战的前线和后方的特点凸现。中国军队在江西境内,先后进行了武汉会战中的赣北作战、南昌会战、浙赣会战、上高会战等正面战场的大规模抗日战役,特别是赣北作战和上高会战均曾给入侵日军以沉重打击,中国军队为坚守住抗战初期形成的战线,阻止日军的继续前进,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

战时江西曾三迁省会。1939年3月,日本侵略军发起进攻南昌战役,江西省党政机关从南昌迁移到吉安。同年底,再迁泰和县,泰和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江西抗战时期的临时省会,行使战时后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职能。1945年2月,因日军进攻赣西,省政府又由泰和迁往宁都,省党部移至瑞金,一直到抗战胜利后迁回南昌。战时行政党务,按照省一级“党政联系”、县一级“党政融化”的原则,调整 and 确立了省党政关系,注重“发挥以党透政、以党透民之精神”,增进党政联系,掌握民众团体,着力在农民、妇女和技术人员中发展党员,开展国民精神动员、抗战建国动员、经济建设和增加生产、征实与征购粮食、扩大征兵、青年从军、慰劳抗战官兵、防空防谍锄伪等活动。当局同时加大力量进行防制和反对共产党活动,1941年底,破坏了中共江西省委机构及其三个特委组织,泰和“马家洲集中营”和第三战区“上饶集中营”,为江西境内关押

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重要监狱。战时江西经济和文化教育在特殊环境和条件下,出现一个很不平常的勃兴之态。江西人民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忍受巨大的痛苦和牺牲,坚忍不拔,同仇敌忾,节衣缩食,献粮出兵,以大量的兵役和粮食支持军需民食,并以不少工业品支援西南大后方,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与此同时,以南昌、九江为中心的赣北14县市,被日军占领,日军在九江建立了伪省政权,对这一地区实行殖民统治。全省60多县先后遭到日军的侵扰,日军在江西境内犯下烧杀抢淫等累累罪行,使江西人民的生命财产和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的损失。1945年9月,第九战区在南昌、九江接受日军的投降,为长期抗战的胜利画上了完满的句号。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取得的第一次伟大的胜利,是包括江西人民在内的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抵抗外敌、追求自由、独立和光明的伟大精神的生动体现。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历史进入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国共两党在中国向何处去这一关系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上,发生尖锐的分歧,两党的谈判和斗争,成为决定战后政局变化和历史进程的根本因素。在这一政治格局中,江西处于后方腹地,属国民党统治的基本地区。面对战后社会的百孔千疮和农工百业的凋敝,江西全省的善后救济和恢复建设有所动作。国共两党和谈失败、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江西省于1947年9月宣告进入“动员戡乱”时期。所谓“动员戡乱”,就是全社会进入战时体制,集中人力、物力进行与中共的战争。9月2日,江西发布《为防匪戡乱告江西全省人士书》,不久,连颁10项法令,成立“江西省剿匪会报”和“戡乱建国动员委员会”,由省政府主席、省党部主委等政、党、驻军、保安、警察、民意机关主要人物组成,作为“动员戡乱”的领导机构,江西政局转入战时体制。全省党政的工作重心,由此全部转向支援和应对“动员戡乱”,持续进行反共侦讯,组训“民众自卫队”,编组保甲户口,修建城垣碉堡,管制交通工具,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以及党团合并。由于全社会无一例外地被纳入“动员戡乱”的战争体制,全省行政围绕这一中心运转,严重影响了地方建设的开展和经济社会的复兴。1949年1月,省政府主席方天兼任省党部主委,是继熊式辉之后独揽党政大权的第二人。方天意图有所作为,但已不可能如愿,布置“应变工作”,建立“潜伏”的地下组织,遂为其关注所在。在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天堑进军江西时,国民党桂系军队节节败退,方天也率党政机构相继由南昌退逃吉安、赣州、广东和台湾,国民党在江西的统治,随着1949年5月省会南昌的解放而告结束。